

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◎选编

百年中国

挚

爱

卷

下

整部中国历史，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。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，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。

经典散文

BAINIANZHONGGUO
JINGDIANSANW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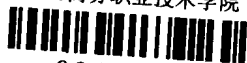
百年中国

挚爱卷

◎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



00431541

声 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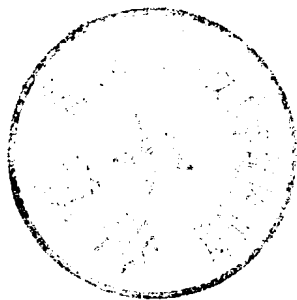
感谢各位入选作者对我们的支持。我们将在本套丛书出版两月内寄奉样书和稿酬。有少数作家或家属因为地址不详无法取得联络，谨表示歉意。敬请这些作家或家属见到此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，以便尽早寄上样书和稿酬。

联 系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总编室或与我社驻北京办事处联系。

电 话：0470 - 8222592

地 址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。

邮 编：021008



里的大人给他加的冕。因为他中午不睡觉，大惊小呼，在壁角的粉苔上分期分批逮捕虫蚁们，又把虫蚁装在火柴盒里，带到这个家里玩，带到那个家里玩，还要叫我买显微镜（实际上是放大镜，但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显微镜，故这么叫），好好来研究这些行为不端的家伙。虫蚁从火柴盒里爬出来，上到大人的床，晚上大人觉到自己被什么古怪的小东西入侵了，腿上手上一遍遍的痒，便想起我儿子的行状来。我去那院子，便有抗议之声不绝于耳。他外婆的讨伐更加直接，是“可恨！”或“我要打他的屁股，用鸡毛掸子！”这便使得我儿极快活，一点小小的把戏，就与这么多的喜怒哀乐纠葛到一处，他于是觉到了自己的重要，他不快活似无道理。

近来我又有了一个发现，我儿像花花公子贾宝玉。送他去上学，临到校门时，四处与他打招呼的，都是女孩子。我就奇怪，问他，与班上什么同学最要好，儿子答曰：“当然都是女同学！”又问他为什么只同女同学耍，不同男同学耍，回答是极认真：“男同学俏皮啊，女同学不俏皮，又听话，又穿花衣裳！”这样的态度，真叫我木在那里不能动。而我儿轻轻巧巧走开，旁边飞翔着粉蝶一样的女同学！这样觑来，他比一个大人要更加明白怎样使自己的日子幸福愉快。他走路一弹一闪像草间的蚱蜢，恰好似一个完全的证明。

我儿也是极情绪的一个，他高兴时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好，吊吊环（我在门上装了一个这玩艺儿，他要起来俨然似山

中活泼的一只猴子)，唱歌（他的乐感真还是蛮不错），画画（他的画还发表过好几回！）……无一不显出一个七岁小孩子天赋的灵性；但他若阴了下来，百事恹恹，恍若是一个小老头，着他一鞭也懒得动弹一两回。但是，我不能怪他，因为他的父亲便是一个情绪的人。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发展若单单受到情绪的怂恿，那是多么危险的一门状态。而你要控制一个七岁孩子的情绪，那又是多么不可能的一桩事！怎么办呢？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任它去。宠儿也算是“宽”的一种。

我儿生性敏感。这大约是他为什么很单瘦的原因。在我看来，敏感与瘦，多半是有些干系的。我经常出差，我妻有时送一送，有时也在门内说一句：保重。算是道别。我儿习以为常，没有额外的割舍，往往只是叮咛，要给他带玩具（或者：“给我捉些昆虫回来！”）。但一九八八年夏，我单独去美国访问，我父亲也来送，我儿便感到此非寻常，一路无语到车站，临别时我说，宽儿，你要好好在家听妈妈的话。他不搭话，脸扭向别处，眼里泪花晶莹着，我有些感动，去吻他，他更加把脸扭过去，而这时他就哭了，什么话却不说，他仿佛明白这是长别离，虽然，那时他才三岁，根本不知道美国是一个怎样遥远的所在。敏于事理，这当然不错，但这也很伤人。一个敏感的人，他的烦恼必是比常态的人多很多。我希望我儿不那么敏感——为他未来的日子计。但是，恐怕我们希望要落空。因为，我儿很瘦。

我儿出世时是哇哇哇哇哭着闹着的一团肉。那时节我没别的想法，只想他快快长到三两岁。到三两岁时，心里又想，要长到七岁，读书，就好办多了。现在，他已是七岁，于是我整日地为他伤着脑子，于是想法又来了：要是十三四岁，念中学了，那就省事了。然而我又明白，到那时，新的麻烦必定又被生产了出来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办法或许只有一个：就是，做父亲的，永远永远的，对儿子取一个“宽”的态度。

卖白菜

莫言

1967年冬天，我12岁那年，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，母亲苦着脸，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，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，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屜，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。母亲叹息着，并不时把目光抬高，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。最后，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，端详着，终于下了决心似的，叫着我的乳名，说：

“社斗，去找个篓子来吧……”

“娘，”我悲伤地问，“您要把它们……”

“今天是大集。”母亲沉重地说。

“可是，您答应过的，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。

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，但她没有哭，她有些恼怒地说：“这么大的汉子了，动不动就抹眼泪，像什么样子?!”

“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，卖了一百零一棵，只剩下这三棵了……说好了留着过年的，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……”我哽咽着说。

母亲靠近我，掀起衣襟，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。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，委屈地抽噎着。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，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。从夏到秋、从秋到冬，在一年的三个季节里，我和母亲把这一百零四棵白菜从娇嫩的芽苗，侍弄成饱满的大白菜，我们撒种、间苗、除草、捉虫、施肥、浇水、收获、晾晒……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手印……但母亲却把它们一棵棵地卖掉了……我不由得大哭起来。

透过蒙眬的泪眼，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。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。最后，那棵最小的、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，挤进了篓子里。我熟悉这棵白菜，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。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，小时被牛犊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脚，所以它一直长得不旺，当别的白菜长到脸盆大时，它才有碗口大。发现了它的小和可怜，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。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，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。母亲知道了真相后，赶紧将它周围的土换了，才使它死里逃生。后来，它尽管还是小，但卷得十分饱满，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：“你看看它，你看看它……”在那一瞬间，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，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。

集市在邻村，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。母亲让我帮她把白菜

送去。我心中不快，嘟哝着，说：“我还要去上学呢。”母亲抬头看看太阳，说：“晚不了。”我还想啰嗦，看到母亲脸色不好，便闭了嘴，不情愿地背起那只盛了三棵白菜、上边盖了一张破羊皮的篓子，沿着河堤南边那条小路，向着集市，蹒跚而行。寒风凛冽，有太阳，很弱，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。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。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，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地时我竟然不知道。篓子落地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，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，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，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。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，骂道：“穷种啊！”然后她就颠着小脚，乍着两只胳膊，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沟底，将那棵白菜抱了上来。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断了，但还没有断利索，有几络筋皮联络着。我知道闯了大祸，站在篓边，哭着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”母亲将那棵白菜放进篓子，原本是十分生气的样子，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，也许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，母亲的脸色缓和了，没有打我也没有再骂我，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：“不中用，把饭吃到哪里去了？”然后母亲就蹲下身，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，我在后边帮扶着，让她站直了身体。

终于挨到了集上。母亲让我走，去上学，我也想走，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。风迎着她吹，使她的身体摇摆，仿佛那风略微大一些就会把她刮起来，她走到我

们的篓子前，看起来是想站住，但风使她动摇不定。我认识这个老太太，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，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。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。母亲回答了她。她摇摇头，看样子是嫌贵。但是她没有走，而是蹲下，揭开那张破羊皮，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。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。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，用弯曲的、枯柴一样的手指，她撇着嘴，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，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：“大婶子啊，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，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，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。”

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，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，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。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：“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！”

老太太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我，问母亲：“这是谁？是你的儿子吗？”

“是老小，”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回话，转回头批评我，“小小孩儿，说话没大没小的！”

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箢放在地上，腾出手，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的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。我十分恼火，便刺她：“别撕了，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？！”

“你这个小孩子，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？”老太太嘟哝着，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。

“大婶子，别撕了，放到这时候的白菜，老帮子脱了五六

层，成了核了。”母亲劝说着她。

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，露出了鲜嫩的、洁白的菜帮。在清冽的寒风中，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。这样的白菜，包成饺子，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！老太太搬着白菜站起来，让母亲给她过秤。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，将白菜提起来。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，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。我看着那棵被剥成了核的白菜，眼前出现了它在生长的各个阶段的模样，心中感到阵阵忧伤。

终于核准了重量，老太太说：“俺可是不会算账。”母亲因为偏头痛，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，对我说：“社斗，你算。”

我找了一根草棒，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，在地上划算着。

我报出了一个数字，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。

“没算错吧？”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。

“你自己算就是了。”我说。

“这孩子，说话真是暴躁。”老太太低声嘟哝着，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，层层地揭开，露出一沓纸票，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，沾了唾沫，一张张地数着。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。母亲也一张张地点数着。

等我放了学回家后，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。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，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，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。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，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母亲抬起头，眼

睛红红地看着我，过了许久，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：

“孩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？”

“娘，”我哭着说，“我……”

“你今天让娘丢了脸……”母亲说着，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。

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，至今想起，心中依然沉痛。

父 亲

素 素

十年前的那一天，父亲像一朵苍白的蒲公英，为太阳做了标本，落在乡下那一座山上，就在那座山上荒芜了。

十年中，最怕人问我父亲做什么，在哪里。一问。心就绞成了绳子。十年中，我无数次坐在桌前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。一铺开稿纸，眼睛就下起了滂沱大雨。一个女孩子不能没有父亲。即使为人妻为人母，做了成熟的女人，也不能没有父亲。因为，人可以同时面对各种感情，每一种都是惟一的，绝对的。

是初秋的一个早晨，我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。看完了，又一份一份装订上。办公室里散发着清扫后那种整洁的气息。这是我留校工作的第一天，非常祥和。

老师们上班来了，检阅我一个早晨的辛苦和不安。我的脸发烧。这时楼下有人喊我接长途电话，声音似不对头。

我飞起来跑到传达室。

大弟在电话里哭得断断续续：“姐，快回来，爹不好了，晚了就看不见了……”

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跌跌撞撞由校区跑到市里，又怎样跌跌撞撞爬上那列即将出站的特快了。当我跑进县医院急救室时，家里许多人都在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大床，父亲像陷在白色泡沫里，等待人去救他。床边，无数条管子通向他的身体，喘息很弱，双目微翕，像在竭力延长早晨那个最甜的梦。我如叶地飘到他的身旁，想从这片安详里寻找死神蠕过的痕迹。可是什么也没有。

父亲的头发像年轻人那么带着油光，且带着自然的卷曲。额头宽而白净，皱纹又浅又淡，回到乡下一比，就知道是城里住地方的。父亲的鼻子挺秀，像女人。嘴唇略厚。线条很温柔，平时总是紧闭着，一闭，下巴就裸露出一片雨点般的肌肉坑儿。不了解父亲的人，就以为他一天总在生气。

可是现在，父亲的嘴唇合不上，下巴松弛得一点波澜也没有。我多么想生出一只神手啊，捉住父亲身体里支撑生命的那几根神经，让他从此醒来！

醒过来就一定是那次栽葱的记忆。父亲让我把葱根摆整齐。我急着去玩就摆得乱七八糟。“摆成什么了！”父亲第一次朝我发火，我扭头就跑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父亲慌了，一头钻进棉槐壕里，叫魂儿似的找：“素儿，里面有蛇，别吓着……”他知道我最怕蛇。

醒过来就一定是那个雨季。老师带我和另一个女学生到县里学跳“忠字舞”。午睡时，天下起小雨，我偷跑出来闲逛。

没想到，在商店门口遇见父亲。他惊喜万分，像绿蝴蝶似的张开雨衣，抱住我淋湿了的小脑瓜。看我一双家做的布鞋变成水鞋，转身走进商店，阔气地买了一双塑料凉鞋。只记得，中午喝汤早晚吃咸菜的父亲，却让我在乡下的那个夏天，变成了公主。

醒过来就是一个严冬漫长的故事：

高考体检的路上，车翻了，伤亡惨重。在我整个的头被绷带裹住理想摔得皮开肉绽的时候，父亲生平第一次那么无所畏，舍了工作陪护我两个月零六天。那是1978年元旦与春节之交。我住在大连的一所大医院里，枕头下藏了一面小镜子，每天以泪洗面。

父亲每早总是最先一个进病房，给我端了尿盆，陪我吃了早饭，然后就搬个小方凳，守在床边用一双慈父的目光照耀着我。屋子里住的全是一起受伤的女孩子，有几次她们想解手。憋得眼神儿都不对了，父亲也没察觉，最后被女孩子们公然“驱逐”。等父亲明白过来，脸就红得像喝了酒，于是一天就在走廊上站着，不喊不敢进屋。

父亲执意回乡下一次，背来一包母亲包的酸菜肉馅饺子。趁女孩子们不注意，父亲把一个小布包塞进我的被子里。一看，居然是女孩子“坏事儿”用的东西。母亲说，他那次回家就是为了取这些东西，饺子在其次。

父亲每早进屋时总是显得又冷又饿。我问他夜里睡在哪

儿。他说，在医院车库一间打更小屋找的宿儿，那屋里有暖气。床也干净。我就信以为真。出院才知道，父亲就在医院前大厅空旷的长椅上，躲过门卫老头一次又一次的“清剿”，披一件大衣睡了六十六个无眠的冬夜……

在母亲眼里，父亲醒过来就一定就是他二十三岁参军走时的样子。穿一身黑棉袍，戴一顶黄毡帽，怀抱两岁的姐姐。对母亲说：“听枣树上喜鹊叫，不是我的信儿到了，就是我人到了。”让母亲后悔昨晚上没把那壶烧开的水浇到他腿上，却煮了路上吃的鸡蛋。

在姐姐眼里，父亲醒过来就一定就是她出嫁那天的情形。父亲抱着小弟逃出送亲的人群，走到大柳树下像小孩子一样哭泣。

在弟弟们眼里，父亲醒过来就一定就是那一次生死关头。他正和母亲烧豆腐汤，大弟小弟爬上柜子，把母亲兑好的一碗卤水当红糖水喝了，喝完了问：“爹，怎么不甜？”父亲一听脸色变了，差了声喊救命，倒是母亲镇定，用手指去抠两个淘气的喉咙……

许多往事积淀在心里，许多泪水一触即不可收。我断不相信，贫穷的时候，幼小的时候，我们有父亲，生活安定，事业成功的时候，父亲会离我们而去！

我不相信。

父亲的身体好极了，他所在的劳改管教支队就有医院，院

长丁伯伯是父亲的老战友。他说父亲甚至没有一册病志。他还说，假如他不开那个玩笑，父亲就不会病成这样。

我不明白他说的什么，我只知道父亲是因为我才病的。毕业时，学校通知我留校工作。过几天，学校又来信说不留我了。记得那是1979年8月末的一天，当我把一切都找回来，重又向父亲报告喜悦的时候，他显得疲惫，脸色苍白，不论我情绪怎样飞扬，他已经激动不起来了。中午的饭也办得潦草，吃几口便放下筷子，一个人看报纸。我也跑累了，打一盆凉水泡脚。要到一点了，父亲说他得去开会，我便看着他走进那座森严的院子。

其实，父亲那几天一直感冒。那个中午，他懒得说话，我也懒得说话。我们都以为这世间有的是供我们父女说话的时光，用也用不完。就在那天晚上，父亲倒下便再也没有起来。他一个人在小火炕的蚊帐里发着高烧，他试图起来过，后背都磨烂了，可是夜太深，太遥远。他烧得口干，喊不出来，烧得骨软，挣扎不起来。那个时刻，父亲的神智一定是清醒的，他心里想些什么？他才五十三岁，连一次生病的经验也没有，他怎么会处理这急来的恶魔呢？

父亲在大院里有一间办公室，里屋便是宿舍。或许是那里面的气氛使他梦中也不轻松，就选择在院外农场的一间平房里住。那天早晨，总与父亲散步打拳的丁伯伯见屋里没动静，以为父亲又熬夜了，便拣来一块木板顶在门上。他想和父亲开个